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2.00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评述

季春芳,李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治国理政的动力、路径和方向,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局面,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范式,并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历史经验与有益参照。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对于深化该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研究以及推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季春芳(1982—),女,安徽芜湖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巢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李正华(1964—),男,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DJ017);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5A417)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7)02-0033-07 **收稿日期:**2016-11-3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生国家亟需恢复、稳定、发展的特殊境况,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以实践行动诠释了治国理政的动力、路径和方向。近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热点,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就这些主要成果作一粗浅总结,以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研究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发展有所助益。

一、治国理政的动力——以人民为中心

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治国理政就没有了目标指向;没有人民群众,治国理政就没有了力量源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治国理政的动力基础。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治国理政的动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障人民利益、肯定人民地位这两个方面。

(一)保障人民利益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保护和发展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安全,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

安全利益是人民群众的首要利益,也是其他诸多利益的前提保障。在旧中国,基层百姓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百姓们颠沛流离,生活毫无保障,甚至生命安全都遭受着威胁。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还领导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并对社会风气进行了治理。沙健孙分析了抗美援朝伟大的历史意义,指出抗美援朝在给予朝鲜有力支援的同时,“对于保卫新中国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对于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保障的作用”^[1];陈竹君、万川肯定了镇压反革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的重要作用^[2];刘世超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旧社会遗留问题时社会治理的经验,并指出社会治理对于国计民生、社会安定起到了重大作用^[3]。

经济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基础利益,也是其他诸多利益的物质保证。要从根本上、长远上保障人民

的经济利益,就必须进行生产力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力整治,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保障人民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陶艳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实现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渗透和控制,这无疑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巩固了新政权”^[4];余平总结了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成效,即“整顿了混乱的市场秩序,确立了新的财经管理体制,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5];宋建领高度评价了三大改造,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

(二)肯定人民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彻底实现了翻身,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并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肯定了中国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

在国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强调“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比《共同纲领》规定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这正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7],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确认;郎友兴纵向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1978年以及1982年宪法中对于人民政治权利维护与保障,解析了1954年宪法中人民政治权利的享有及其重大的社会学意义^[8];韩大元论述了1954年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在保障人民权力、人民当家作主方面的一致性^[9]。

在政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有力举措。万其刚梳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指出1954年的宪法“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不仅正式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开启了我国民主法

制建设的新时代”^[10]。方宏伟、卢正涛高度评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人民地位的保障关系,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发扬民主的最好形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形式”^[11];沈寿文论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横向(水平)配置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具备纵向(垂直)国家权力的国家结构形式功能”,突出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国家权力的配置^[12]。

二、治国理政的路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

治国理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治国理政就不能顺利进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治国理政就难以取得成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的必由路径。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治国理政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和制度优势,亦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与首要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有着绝对的必要性;坚持党的领导,还要讲究方法的科学性。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方面,辛鸣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指出了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党的领导弱化、软化、虚化对于中国发展的危害性^[13];杨建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对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地位、促进经济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政府的稳定以及提高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14];李慎明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关键”,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本质”,“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需要“在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不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15]。

科学的领导方法是治国理政的有效保证,治国理政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坚持党的科学领导。

对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姜裕富、齐卫平分析了党的领导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与党领导一切以及党的领导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一元化是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领导一切是执政方式问题,纵览全局、协调各方是领导方法问题”^[16];朱佳木通过对1954年宪法的分析,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17],并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常建宏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统揽全局,集中力量做好中心工作”、“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广泛交流经验,提高工作水平”、“宣传发动群众,形成强大合力”以及“加强制度制约,注重从制度上拒腐防变”^[18]等方面。

(二)加强党的领导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一方面取决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另一方面取决于党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就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巨大努力。

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的改观导致了部分党员在主观思想上的蜕变。中国共产党是治国理政的核心,为克服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的不良思想倾向,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防范党员思想蜕变,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张才良归纳了开国头三年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党在注重理论教育、重视自身建设、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经验^[19];曹伟丽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建设历程,指出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的免疫力”^[20];欧阳恩良认为党的思想教育“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有力地保证了各项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1]。

从组织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党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有效举措。罗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建设的背景,包括“降低党员标准,党员质量下降;党员教育管理落后,出现错误思想倾向;党组织分布不均,党员结构不合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此外,他还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与历史经验^[22];王先俊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层组织的整顿、建立新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等方面”,并指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大意义,即“不仅使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和富有活力,而且也为党的执政治国活动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支持”^[23];赵铁锁、秦明月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国建立了较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使干部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化的轨道”^[24]。

从作风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并以执政党的身份控制和监督国家政治权力。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新环境下,如何认识和运用手中的权力,如何廉洁自律以加强治国理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课题。王传利从制度建党的视角,解析了从制度上反对腐败、肃清党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强调了“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建设的重要性^[25];张鸿石、周喜华从“加强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实现执政党角色的转变”、“加强党的廉政作风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以及“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的视角,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作风建设的三重维度^[26];高建林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朴素理念出发,引导出“开展专项斗争,惩腐倡廉”、“建立监督机制,监督保廉”、“整党整风,整党促廉”以及“加强理论学习,自律思廉”的党风建设的具体措施^[27]。

三、治国理政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治国理政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就会失去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就会走上邪路。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国理政的方向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工程。通过开展各种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建立了与新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

形态,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路径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即围绕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围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阶级教育,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出了应该确立马克思主义即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切实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人民的觉悟和理论水平。王磊系统阐释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抗美援朝、整风运动以及土改运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教育的策略与启示^[28];余君、李燕详细描述了在党内、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农民中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措施^[29];谢迪斌深入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结合乡村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3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还成功地吧马克思主义由党内扩展到了党外、由老解放区推广到了全国,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并为后期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黎见春从“整肃精神市场,扫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权威”、“促成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化”以及“营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氛围”等四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31];李祥兴从顶层制度设计、围绕中心工作、回应和引领社会思潮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载体平台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进行了归纳^[32];曾向阳从坚持党的领导、建立管理体制和开展宣传工作的角度凝练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巩固和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3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领域的一项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党在治国理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勇于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成果的具体表现上,姚宏志认为,1949—1957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稳步推进时期,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诸如“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和“八大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成果^[34];闻君宝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知识分子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并认为知识分子改造

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35];梅荣政、荣枢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36]。在成果的贡献者上,王心月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不懈探索与努力追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直接理论渊源和历史实践基础”^[37];耿显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38];陈答才认为“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39]。

四、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以及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作为学界兴起的热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但由于“治国理政”具体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加之理论研究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自然发展的生态过程等原因,目前,有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也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该问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一)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总体上还不够醇熟完善,现有成果大多都是附带于其他问题之上的较为浅层的论述,其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研究视域不够广角、研究内容不够丰富以及研究方法不够多元等方面。

1. 研究视域不够广阔

从研究视域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微观研究颇多,宏观研究较少。首先,较少有学者从“治国理政”的宏大视野出发,来全面定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概念,深刻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集中展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其次,较少有学者从整体性的思维出发,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微观层面的同时,建构一个系统完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有机整体,当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全貌还有待于进一步呈现。再次,较少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出发,整体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伟大意义。因此,打开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视角,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角度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进行谋篇布局,是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必要之举。

2. 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研究颇多,理论研究较少。首先,较少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立场,从国家专政和管理的双重职能的维度,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时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学理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治国理政的思考与探索,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国家学说基础上的开拓与发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中国建立后治国理政思想的选择与构建甚是必要。其次,较少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动态演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的演进路径、深入阐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细致分析其与毛泽东思想之紧密关系。因此,丰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内容,在具象的实践案例之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进行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深化该领域研究之必然之举。

3. 研究方法不够多元

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历史研究法运用的颇多,综合研究法运用的较少。首先,多数学者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历史时期来研究与治国理政相关的案例,历史研究法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史实的梳理整合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这一复杂研究对象来看,单纯的历史研究法还不能够多维立体地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部内涵与意义。其次,较少有学者结合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进行分类与综合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十分

广泛,单凭某一学科某一方法很难达到预期研究效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有益之举。

(二)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起始阶段,但根据现实需要以及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在接下来的研究当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战略布局的内在机理、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以及客观作用与历史地位都是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重点问题。

1. 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逻辑严密的缘起及生成路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国治理优良传统是其历史逻辑,新生国家亟需恢复、稳定、发展的刚性需求是其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是其理论逻辑,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是其实践逻辑。这四重逻辑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逻辑有机体,生动形象地传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萌生的逻辑进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路径内蕴着丰富的哲理,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大智慧、大逻辑。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缘起生成的逻辑路径,是当前我们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

2. 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战略布局的内在机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内涵丰富的战略布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治国理政各个内容层面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政治体制的建构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前提要求,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本质要求,思想文化的繁荣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区域社会的安定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具体要求,外交局面的打开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国际要求,军事力量的强大是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安全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蕴含着深厚的智慧,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彰显了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战略布局的内在机理,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客观问题。

3. 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鲜明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新中国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人民性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是从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对人民性的升华;马克思主义性指引了治国理政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和思想境界的高度。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综合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础上,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战略性和创造性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科学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战略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够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创造性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够立足实际、不断创新。阐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鲜明的本质特征与性质特征,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4. 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客观作用与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重大的客观作用与重要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重大的客观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即时效应来看,经过建国头七年的国家治理,我国已经从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转变为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国家。1956年底,我们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参考文献:

- [1]沙建孙. 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意义[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7).
- [2]陈竹君、万川. 建国初期毛泽东镇压反革命思想述评[J].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6).
- [3]刘世超.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问题的治理及其成功经验——以禁毒、禁娼、剿匪为例[D]. 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1.
- [4]陶艳梅.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述论[J]. 中国农史,2011(1).
- [5]余平. 中财委与新中国初期经济秩序的确立[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 [6]宋建领. 对三大改造的认识[J]. 中学政史地,2012(4).
- [7]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M]. 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218.

造,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程度较之1949年建国时前进了一大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长远效益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持续发展、为世界体系中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它是在综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大国治理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开创了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应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参照。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客观作用与历史地位,探讨其对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照,是当前研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结语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也为以后更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但由于“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40],加之已有成果还有诸多有待拓展与深化的空间,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这一课题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以历史眼光和历史思维剖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各个维度、各个层面之外,我们还要以时代眼光和战略思维去关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动向、新举措,要始终本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理念,力求使我们的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 [8]郎友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及其社会学意义[J].开放时代,2001(11).
- [9]韩大元.1954年宪法的历史命运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J].法律科学,2004(5).
- [10]万其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 [11]方宏伟,卢正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民主的最好形式和最高形式[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 [12]沈寿文.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配置功能[J].法学论坛,2014(3).
- [13]辛鸣.坚持党的领导的“中国道理”[J].南风窗,2016(14).
- [14]杨建.论新中国建立60年来坚持党的领导的意义及启示[J].世纪桥,2009(10).
- [15]李慎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的关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3).
- [16]姜裕富,齐卫平.坚持党的领导三个相关概念的辨析[J].理论探讨,2015(6).
- [17]朱佳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2).
- [18]常建宏.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简析[J].党的文献,2013(3).
- [19]张才良.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重要经验[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 [20]曹伟丽.建国以来党的思想建设历程的回顾与思考[J].湖湘论坛,2010(3).
- [21]欧阳恩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历史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
- [22]罗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研究综述[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4(5).
- [23]王先俊.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07(5).
- [24]赵铁锁,秦明月.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理论学刊,2009(3).
- [25]王传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制度建设论析[J].政治学研究,2014(6).
- [26]张鸿石,周喜华.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 [27]高建林.建国后我党党风廉政建设理念的跨越与升华[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1).
- [28]王磊.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策略与启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 [29]余君,李燕.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选择及历史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
- [30]谢迪斌.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乡村的实践[J].中共党史研究,2011(5).
- [31]黎见春.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考察[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1(12).
- [32]李祥兴.论建国初期的冬学运动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33]曾向阳.新中国60年党巩固和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J].南京社会科学,2009(9).
- [34]姚宏志.建国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和经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 [35]闻君宝.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 [36]梅荣政,荣枢.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2009(19).
- [37]王心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 [38]耿显家.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以1949—1966的经济工作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 [39]陈答才.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
- [4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上册[M].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i Chunfang, Li Zhenghu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arduous exploration 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explained the power, path and direction of governing affairs with practical action. It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and offered a mode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it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govern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study of governance in that tim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overnance; summary

[责任编辑 张家鹿]